

《中華民國發展史·社會發展》

「社會意識」

林 端（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一、 前言：兩個「他者」的挑戰與中華民國「自我」的回應——

研究「社會意識」的史觀與出發點

「社會意識」也許是我們「社會發展」這一分冊最難加以定位的章節，基本上我們認為這就像是文化社會學相對於社會制度結構分析與政治經濟學，「社會意識」指涉的是影響社會中人的社會思想文化、價值觀與意識型態，相對於社會制度結構基礎。由於鴉片戰爭以後，中華文化面臨亙古未有之巨變，因此百年來中華民國「社會意識」發展史，其實就是整體社會劇烈的社會意識變遷的歷史，這是與中/西、傳統/現代，這兩個主要的對比框架不可分的，中華民國百年來的社會意識在社會各領域裡，都面臨西方文化的挑戰，在回應與創新的變遷過程裡，傳統的社會意識逐步蛻變成現代的社會意識。

所謂的「社會意識」，比起其它的題目相對來說，比較難以確定研究範圍，但也因為這種不確定性，讓我們可以反省思考宏觀的問題，也就是我們撰寫中華民國史百年來的社會變遷。這一百年來，表面上前三十八年，在一個巨大的中國發生的歷史，而後六十二年則是在相對幅員較小的台灣的中華民國史，大中國與小台灣，這似乎是一個歷史上的斷裂，但是歷史總是有其連續性的，並不因為改朝換代而中斷其連續性，所以我們討論百年來中華民國的社會意識變遷史，也必須從一個宏觀的角度建立某種史觀，在這個史觀的基礎之上，建構我們的分析，進行我們的深入研究。

我們首先想到的是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 1889-1975）的「挑戰與回應」的理論，整個中國的劇烈變化，尤其是 1840 年的鴉片戰爭，西方人的船堅砲利打開了中國的門戶，中國人第一次發現遭遇強大的對手，態度由倨傲轉為自卑，由抗拒西方轉為向西方大量學習，在科技之外更學習西方人的典章制度。所以清末民初到現在民國一百年，整個巨大的歷史文化背景便是面對西方文化的全面性的優越的、科學技術與典章制度的挑戰，中華文化所提出來的回應的策略。因此，我們討論社會意識的史觀，首先是西方文化所造成的社會意識的變遷，中華文化的社會意識的改變，其最大的演變的動力，並不是內生的，而是外來的，是這個強勢的外來文化入侵，強迫著中華帝國朝向中華民國發展，後來又造成中華民國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隔岸對峙，也就是因為巨大的社會變遷以及社會意識的變遷，其主要動力不是內生的，而是外來的。因此，中國人的「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就變成主要是中華文化的「自我」對西方文化的「他者」所作出的回應。向西方文化學習，帶動了中華文化內在的變遷，這不妨礙到它會發展出自己的邏輯與軌跡來，就好像韋伯（Max Weber, 1864-1920）認為由秦漢到明清傳統中國是一個「停滯性的社會」，但一旦繼受了西方的企業資本主義，現代的企業資本主義也會在中國人的土地上生根發芽。所以百年來中華民國社會意識變遷的歷史，在外部環境是有西方列強侵略的背景，而內部環境則是既有的小農經濟、一治一亂的中華帝國，無法應付西方工業革命、民主革命與企業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嶄新局面，所以我們討論討論百年來的中華民國社會意識的變遷史，很重要的一個角度，便是從中西文化關係史，或者說中西文化的衝突與融合的角度，來看社會意識的變遷。

在以西方文化為「他者」的情形下，中華文化的「自我」形塑，如何接受西方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就變成首先在大陸時是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後來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分野。其中國民黨接近資本主義，對傳統中華文化較為同情，共產黨則是接近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以反傳統文化起家。在這種情形下，中華民國的歷史，尤其是 38 年遷台之後，便是面對兩個重要他者（西方文化他者、共產中國他者）所進行自我建構的過程，換句話說，我們如何定位傳統中華文化，以及如何因應晚近的全球文化的挑戰，也都是在面對這兩個他者的情況下進行的。

這兩個重要的他者，對我們的文化發展有所制約，但卻無法妨礙我們文化發展的「固有法則性」（*Eigenetzlichkeit*, 韋伯語）。此地我們的立場，比較接近伊里亞斯（Norbert Elias, 1897-1990）長期歷史的「過程社會學」與「社會學關係主義」的看法。以社會意識來說，中華文化的社會意識與西方文化的社會意識相互指涉、相互倚賴，儘管目前來看，一直是西風壓倒東風，但是在歷史長時間的過程中，這種優勢、劣勢的型態也可能會逐漸改變。同樣的，中華民國的社會意識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意識相互指涉、相互倚賴，也是一個長時期相互影響的過程。這種長時期的歷史變遷過程，可能長達數百年之久，我們現在所撰寫的一百年的社會意識的變遷，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部份而已。

進而言之，在中華民國自我主體性文化之內，社會意識與政治、經濟、科技等社會部門，也是相互倚賴、相互影響的。此地我們的立場，比較接近韋伯的「多元因果論」，認為歷史文化的變遷並不是像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的「歷史唯物論」所謂的「存在決定意識」，以經濟為基礎的下層建築，制約或決定了社會文化意識等上層建築的發展。相反的，社會意識、宗教藝術與文化等上層建築，在天時、地利、人和條件具備之下，社會意識除了有其「固有法則性」之外，

還有可能對於政治、經濟產生具體的影響。在歷史長期變遷的過程中，過度唯心的文化的、意識的決定論，或者過度唯物的、經濟的、物質的決定論，都不是我們認可的史觀與研究立場。我們以下對百年來中華民國「社會意識」變遷史的描述與分析，也是在此立場上的檢選與詮釋，掛一漏萬，在所難免，這是我們要對讀者事先說明的。為了避免與其他章節的重複（如新文化運動、社會運動、婦女、原住民、族群、教育等），也為了突顯中華民國「社會意識」百年來的歷史，是面對兩個重要他者（西方文化他者、共產中國他者）所進行自我建構過程的重要部份，我們檢選了六個重要的子題，進行中華民國「社會意識」百年來歷史的深入探討。

我們選擇的子題如下：傳統社會意識掙扎中的孔子與孔教、醫療意識的變革、新生活運動對社會意識的形塑、法律意識的變遷、平等意識的追求，還有遺民意識的固著與超越等六大議題。